

# 中原地区东周铜器墓中的仿古器物\*

张亮(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讲师)  
滕铭予(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教授)

DOI:10.13619/j.cnki.cn11-1532/k.2017.07.005

中原地区通常是指黄河中游沿岸的山西中南部、河南大部、河北南部、陕西东部等地,东周时期分布在此区域的文化主要是晋文化及三家分晋后的三晋文化,也包括周王室及后分封的东周、西周两个小诸侯国的文化,所以这一地区也被称为三晋两周地区<sup>[1]</sup>。该地区出土青铜礼器的东周墓葬中,经常发现部分铜礼器的器类和形制与当时流行的器物存在明显差异,而呈现出较早时期的特点和风格,同时这些青铜器往往饰有当时流行的纹饰,显然并不是传世品,而是与其他青铜器同为当时所造。国内已有学者注意到这一现象,并将这类器物视为仿古之器<sup>[2]</sup>,亦有部分国外学者对这种仿古现象进行讨论<sup>[3]</sup>,但多为定性描述,尚缺乏系统的梳理分析。本文拟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全面收集中原地区东周时期铜器墓葬资料,从中判别出随葬的仿古器物,尝试分析其特点及相关问题。

—  
本文统计的东周时期铜器墓葬共 280 座。

山西境内有侯马上马<sup>[4]</sup>、牛村古城南<sup>[5]</sup>、下平望<sup>[6]</sup>、曲沃北赵晋侯<sup>[7]</sup>、运城南相<sup>[8]</sup>、万荣庙前村<sup>[9]</sup>、临猗程村<sup>[10]</sup>、芮城<sup>[11]</sup>、闻喜邱家庄<sup>[12]</sup>、上郭村<sup>[13]</sup>、新绛柳泉<sup>[14]</sup>、长治分水岭<sup>[15]</sup>、长子<sup>[16]</sup>、潞城潞河<sup>[17]</sup>、屯留<sup>[18]</sup>、交口<sup>[19]</sup>、太原金胜村<sup>[20]</sup>。河南境内有洛阳的中州路<sup>[21]</sup>、中州中路<sup>[22]</sup>、中州路北<sup>[23]</sup>、西工区<sup>[24]</sup>、王城广场<sup>[25]</sup>、王城北春秋墓<sup>[26]</sup>、润阳广场<sup>[27]</sup>、体育场路西<sup>[28]</sup>、纱厂路<sup>[29]</sup>、针织厂<sup>[30]</sup>、高速公路伊川段<sup>[31]</sup>、凯旋路南<sup>[32]</sup>、唐宫路小学<sup>[33]</sup>、道北锻造厂<sup>[34]</sup>、三门峡的西苑小区<sup>[35]</sup>与盆景园<sup>[36]</sup>、陕县后川<sup>[37]</sup>、上村岭<sup>[38]</sup>、郑州加气混凝土厂<sup>[39]</sup>、登封告成<sup>[40]</sup>、新郑李家楼<sup>[41]</sup>、唐户<sup>[42]</sup>、兴弘花园与热电厂<sup>[43]</sup>、铁岭<sup>[44]</sup>、新禹公路<sup>[45]</sup>、郑韩路<sup>[46]</sup>、安阳王古道<sup>[47]</sup>、辉县琉璃阁与山彪镇<sup>[48]</sup>、平顶山应国墓<sup>[49]</sup>。河北境内有邯郸百家村<sup>[50]</sup>和邢台南大汪<sup>[51]</sup>。

通过对这些墓葬中的随葬器物进行观察和分析,共判别出随葬的仿古器物 231 件,分属于 52 座墓葬。根据墓葬的年代<sup>[52]</sup>及仿古器类的差异,可以将这些墓葬中出土的仿古器物分为两类,即春秋早期早段的仿古铜酒器和春秋中晚期至战国中期的仿古铜礼器(附表一、二)。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洛阳地区东周墓葬制度”(项目批准号:16YJC780004)的中期研究成果。

### 1. 春秋早期早段的仿古铜酒器

#### (1) 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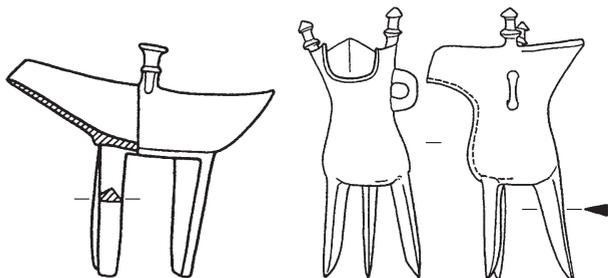
铜爵始见于二里头文化，流行至西周，西周中期后基本不见。该阶段的中原地区铜器墓葬中发现铜爵13件，均为素面，制作粗糙，通高9.5~17.5厘米。铜爵内多存范土，可见其是仿商至西周早期的实用性铜爵而专为随葬制造的明器。部分铜爵的明器化程度较高，仅保留了铜爵的部分形制特征，如上村岭M2012:75，体似匝，浅腹，四足，通高12.8厘米（图一：1）；另外也有部分铜爵的形制与商末西周时期铜爵相近，如北赵晋侯M93:47，素面，三锥形足，带菌状柱帽的双柱立于口上，通高15.6厘米（图一：2）。

#### (2) 觥

铜觥自商代中期出现，西周早期流行，西周中期以后则基本不见。该阶段的墓葬中出土有14件铜觥，多素面，深腹，细长颈，腹内多残存范土，应属明器。这些铜觥通高多为11.5~16.5厘米，与商周时期的实用铜觥相近，如上村岭M2001:132，通高13.2厘米（图二：1）。部分铜觥的底位于腹中部，如上村岭M2012:22，通高14.8厘米（图二：2）。另外，北赵晋侯M93出土的一件铜觥制作精致，腹部饰三角纹，圈足饰垂鳞纹，通高14厘米（图二：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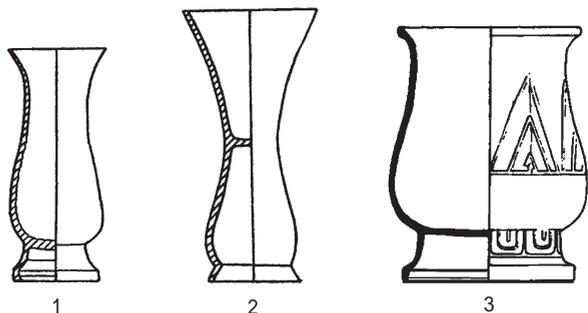
#### (3) 尊

铜尊流行于商代前期至西周中期。最初的铜尊形制多为大口有肩，商末开始流行粗体觚形尊。该阶段铜器墓中出土铜尊9件，均为粗体觚形尊。根据形制差异，可将其分为两型：一为三段式尊，即从外观上看器身明显分为上腹、腰（下腹）、圈足三段，如平顶山应国M8:19，通高22.5厘米（图三：1），此型尊流行于商末周初；一种为两段式尊，即上、下腹部之间无明显分界，遂由三段变为两段，如上村岭M2001:131，素面，通高17厘米（图三：2）；部分铜尊在其腹部另附有对称的扁平形曲耳，如上村岭M2006:47，素面，通高13厘米（图三：3），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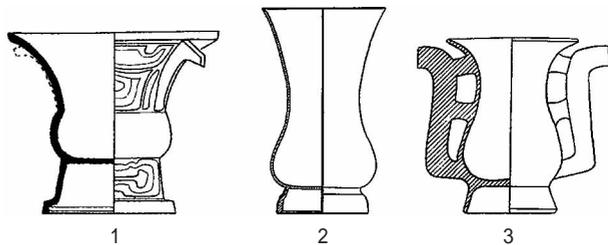
图一 铜爵

1. 上村岭(M2012:75) 2. 北赵晋侯(M93:47)



图二 铜觥

1. 上村岭(M2001:132) 2. 上村岭(M2012:22) 3. 北赵晋侯(M93:48)



图三 铜尊

1. 平顶山应国(M8:19) 2. 上村岭(M2001:131) 3. 上村岭(M2006:47)

型尊流行于西周早、中期。

#### (4) 方彝

铜方彝流行于商代晚期，西周早期开始数量渐少，之后仅在个别地点有零星发现。该阶段墓葬中出土铜方彝18件，可分两种类型：一种不具备实用功能，器盖与器身浑铸一体，或素面，或有纹饰及扉棱，通高10~15厘米，小于实用器；仅在平顶山应国M1出土的一件铜方彝与实用器大小相当，通高为27厘米（图四：1）。另一种为实用器，器盖与器身分铸，制作较精

细,器身与器盖上均有纹饰,并有扉棱,通高19~25厘米,如北赵晋侯 M93:51,器身饰有当时流行的云纹、重环纹等纹饰,盖及器身四角有扉棱,通高24.4厘米(图四:2)。

### (5) 卣

铜卣流行于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西周中期以后少见。该阶段的北赵晋侯 M93 出土一件铜卣,颈部饰有重环纹,圈足饰垂鳞纹,通高18.2厘米(图五)。

### (6) 觚

铜觚始见于早商,流行于商代中晚期,西周早期渐衰。该阶段的上村岭 M2012 出有一件铜觚,素面,口至腹部有四条扉棱,通高仅11.8厘米(图六)。

## 2. 春秋中期晚段至战国中期的仿古铜礼器

### (1) 无盖鼎

鼎是商周青铜器中数量最多、地位最为重

要的器类。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中原地区的铜鼎均立耳或附耳无盖鼎,春秋中期早段墓葬中所出铜鼎仍旧无盖且多饰有西周晚期以来流行的重环纹、窃曲纹,而该时期其他铜礼器则已经流行S形龙纹、三角涡纹等新纹饰,推测这些无盖鼎是早期制作流传至该时期的。春秋中期晚段开始普遍流行附耳有盖鼎,仅在个别墓葬中出有无盖鼎,其形制与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墓葬所出者基本无别,但已不见西周晚期以来的传统纹饰,而多在腹中部装饰当时新流行的蟠螭纹或凸弦纹(图七)。这些器物明显为当时所造之器,但仍保留了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传统形制,应是仿古之器。春秋中期晚段以后至战国中期,盖鼎盛行的同时,无盖鼎一直有少量存在,这些无盖鼎应该都属于对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铜鼎的仿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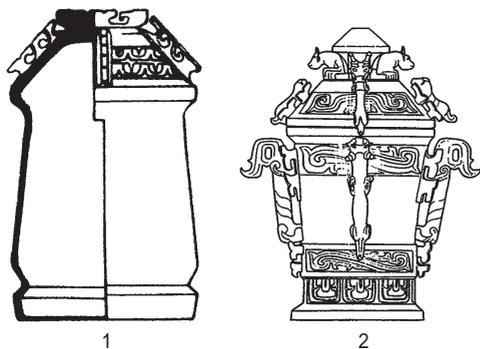
### (2) 簠和方座豆

铜簠始见于早商,西周以后开始流行,与鼎以一定数量关系相配而成为周代用鼎制度的核心。春秋中期早段开始,铜敦的出现替代了铜簠。春秋中期晚段以后的极个别墓葬中出土有铜簠,大致可分两型:一种为鼓腹有盖,双环耳,圈足下接三小足(图八:1),此型铜簠是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非常流行的样式,应是仿其所作;另一种为方座铜簠(图八:2),这种在器身下附加方座的做法常见于西周时期,之后基本不见,虽然春秋中期晚段以后的此型铜簠的上部形态与古制不同,但附加方座的做法可视为局部仿古。

此外,在太原金胜村、长子牛家坡 M7 等少数战国早期墓所出铜豆附有方座(图九),这应该也是受西周时期方座铜簠的影响而出现的局部仿古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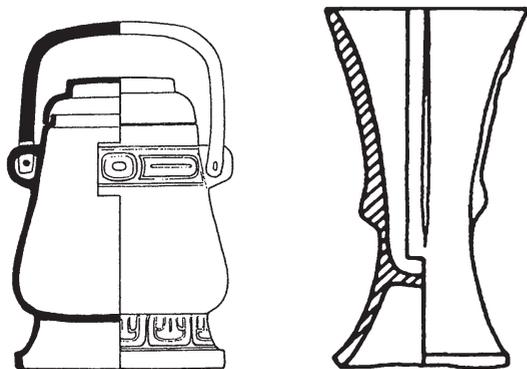
### (3) 壶

铜壶始见于商代中期,流行于西周至汉代。春秋中期晚段的新郑李家楼大墓出土的铜方壶,颈长且较粗,垂腹,莲花盖,盖上立鹤,颈两侧双耳外附兽,圈足下安双兽为足(图一〇:1)。粗颈垂腹及下腹部装饰粗犷地纠结在一起的龙纹为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风格,属于仿古



图四 铜方彝

1. 平顶山应国(M1:55) 2. 北赵晋侯(M93:51)



图五 铜卣

图六 铜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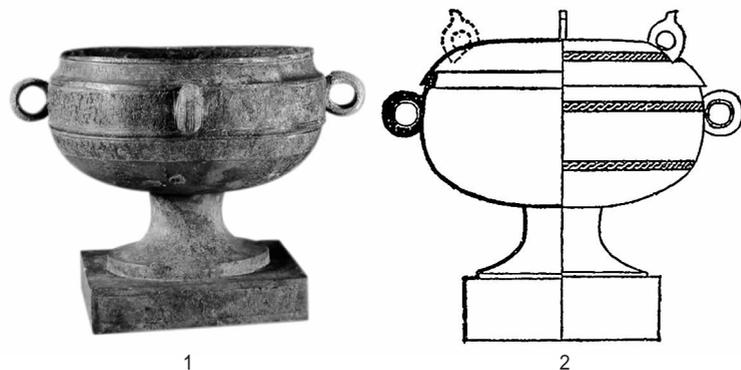
图七 无盖铜鼎

1. 洛阳纱厂路(JM32:5)
2. 洛阳体育场路西(M8832:3)



图八 铜簋

1. 新郑李家楼墓葬
2. 琉璃阁甲墓



图九 方座铜豆

1. 太原金胜村(M251:572)
2. 长子牛家坡(M7:14)

现象，而立鹤附兽及器身所饰的蟠螭纹为当时新流行的做法。类似的仿古铜壶也见于洛阳体育场路西 M8821(图一〇:2)、琉璃阁甲墓和乙墓。

#### (4) 铺

铜铺即镂空柄铜豆，浅腹、平底。该类器物流行于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之后基本不见。年代属于春秋晚期晚段的琉璃阁乙墓中出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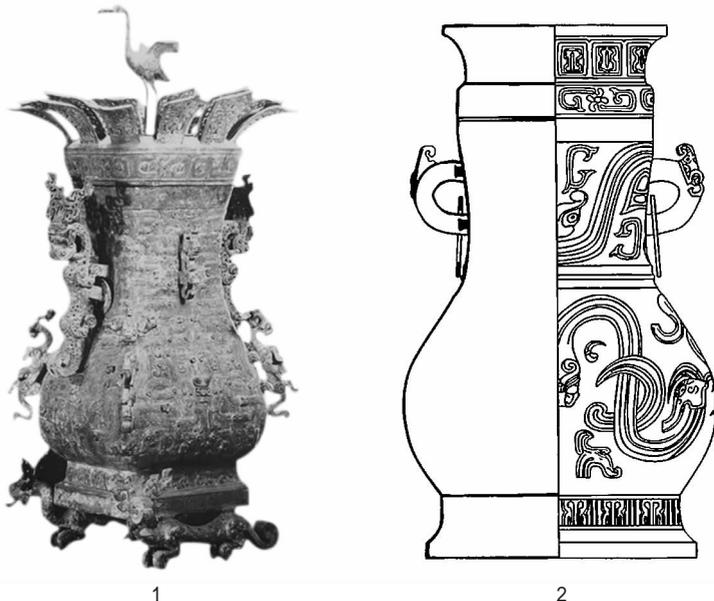
一件铜铺(图一一)，制作粗糙，应为仿古之器。

## 二

上文将中原地区东周铜器墓中出土的仿古器物分为春秋早期早段的仿古铜酒器和春秋中期晚段至战国中期的仿古铜礼器两类，出有仿古器物的墓葬基本信息分别见附表一、附表二。

图一〇 铜 壶

1. 新郑李家楼墓葬
2. 洛阳体育场路西(M8821:14)



由附表一可知,春秋早期早段的仿古铜酒器多成组出现,主要以爵、觶为核心,多配以尊、方彝,个别墓葬见有卣和觚。这些器物绝大多数流行于晚商至西周早期,其中爵、觶相配使用的组合形式主要见于西周早期,因此可推测该时期的仿古现象主要是仿西周早期之制。需要指出的是,铜方彝多见于晚商,西周早期少见,这可能是时间久远,当时人已对西周早期之制不甚了解之故。这些成组的仿古酒器绝大多数仿制质量极为粗糙,不仅尺寸小,而且通体素面。少数器物仿制质量相对较好,如北赵晋侯 M93 出土的觶、尊、方彝、卣等,器物本身不仅具备实用功能,而且还装饰有一些当时流行的纹饰。在同一座墓葬中也存在仿制质量相差较大的器物,如平顶山应国八号墓中出土的两件方彝,一件制作较精致,器盖与器身分开,且均有纹饰,盖及上腹四角饰有扉棱;而另一件方彝的器盖与器身则浑铸为一体,通体无装饰。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少数器物仿制质量较好,具备实用性,但与其他实用铜礼器相比,质量仍存在明显差距,其还应属于专为随葬而制作的明器。这些成组的仿古酒器多与同为明器的鼎、簋、盃等器物共出,构成了一个包含食

器、酒器、水器的完整的明器组合。目前出土有仿古酒器的墓葬均属于中高等级铜器墓葬。从分布范围上看,遍及山西南部及河南中西部,基本覆盖了中原地区春秋早期铜器墓的所在区域。笔者统计的春秋早期早段未被盗的中高等级铜器墓葬共 14 座,其中有 8 座墓葬存在此类仿古现象,可见这种仿古现象分布范围广,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由附表二可知,春秋中期晚段至战国中期的仿古铜礼器主要为无盖鼎,部分墓葬另配有仿古的铜簋、铜壶或方座铜豆等,这些器物均仿制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同类器物。整体上



图一一 铜 铺

看,仿古器类较少,形制单一,各时期及各地区仿古器物本身并无明显的形制变化。大多数仿古铜礼器是对古代器物形制的仿制,同时也存在一些对古代装饰风格的模仿。这些器物绝大部分质量较好,与其他非仿古类实用礼器基本没有差别,应为实用器。极少部分仿古铜礼器为明器,如山彪镇M1出土的8件立耳小铜鼎,质量粗糙,器甚小,高不足5厘米。此类仿古现象的分布范围广,遍及整个三晋两周地区。虽然从单独的仿古器物本身来看,各地区差别不大,但在出有仿古器物的墓葬等级以及仿古器物的组合方面,洛阳地区与三晋地区存在着明显差异。

洛阳地区出有仿古器物的墓葬在低、中、高等级墓葬均有发现,其中以低等级墓葬数量最多,年代主要集中在春秋中期晚段至春秋晚期晚段。除了洛阳体育场路西M8821的仿古器物组合为无盖鼎和方壶之外,其余墓葬仅见有数量不等的无盖铜鼎。该地区的中、高等级墓葬在出有无盖鼎的同时均共出有当时流行的有盖铜鼎,而低等级墓葬既有部分墓葬仅见无盖铜鼎,又有部分墓葬共出有盖铜鼎。

三晋地区出有仿古器物的墓葬中,仅陕县后川M2056一座属于低等级铜器墓,其余墓葬均为中高等级铜器墓。墓葬的年代跨度较长,从春秋中期晚段一直延续至战国中期。仿古器物绝大多数为无盖铜鼎,部分墓葬还配有铜簋、铜壶、方座铜豆等。各墓在出有无盖铜鼎的同时,均另配一套当时流行的有盖铜鼎。春秋中晚期,出有仿古器物的高等级铜器墓中,无盖鼎的数目均不少于5件,中等级铜器墓中无盖鼎的数目多为2~3件。而到了战国早期和战国中期,仿古器物仅见于高等级铜器墓,且无盖鼎的数量开始减少,个别墓葬仅有1~2件或不见无盖鼎,同时还出现了非实用的无盖鼎。

### 三

有学者曾从艺术史的角度提出,仿古铜器作为一种仿古艺术,其产生基于古人“以古为雅,以今为俗”<sup>[53]</sup>的心理。通过上文对中原地区东周铜器墓中两种不同形式仿古现象的总结

梳理,可认为这种现象的出现除了与古人好古思想有关外,似乎还存在其他一些寓意。

春秋早期早段仿古器物仅出现在中高等级铜器墓中,均为酒器,多成组出现且为西周早期流行、西周中晚期已基本不见的爵、觶相配的组合形式。仿古酒器均为明器,大部分制作较为粗糙,器物本身多不具有实用性,显然其并不具备艺术价值和礼制功能。此类仿古现象仅出现在春秋早期早段,多见于晋国、虢国、应国、郑国及王畿地区中高等级铜器墓中,其代表的人群均与周王室关系密切。以上现象很可能表明,这些与周王室有着密切联系的人群,在平王东迁、王室衰微之际,通过仿造西周早期流行的铜酒器来表达他们对代表西周早期礼制器物的喜爱,并借此传递他们对西周早期礼制的向往和对曾经使用过这些酒器的贵族祖先的追忆,对昔日各诸侯国可以依恃的周王室的怀念。

春秋中期晚段到战国中期的仿古器物均为仿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流行的铜礼器。由于春秋早期的铜礼器多为西周晚期的传统,所以此类仿古器物可以看成是西周晚期铜礼器的延续。此阶段洛阳地区墓葬中出现的仿古器物主要是无盖铜鼎,均为实用器,在高、中、低等级铜器墓中都有发现,是当时贵族较为普遍的一种随葬行为。由于鼎在用鼎制度中占据着核心地位,在已经出现新型的有盖鼎的同时,这些墓葬仍然使用传统的无盖鼎,一方面表明当时无盖鼎在用鼎制度中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体现出墓主人对原有用鼎制度表现方式的固守。部分墓葬在使用无盖鼎的同时随葬有盖鼎和其他类当时流行的铜礼器,这可能反映出两周地区的部分王室贵族在保有原有礼制的基础上已逐渐接受了新的礼制。

三晋地区的仿古铜礼器除了有无盖鼎,部分墓葬还配有簋、壶、方座豆等。与洛阳地区不同,三晋地区出有无盖鼎的墓葬,均另配有成组的盖鼎,这种现象在中高等级铜器墓中极为普遍,却基本不见于低等级铜器墓,应该是中高等级贵族墓特有的现象。春秋中期以后,晋国开展了一系列的社会变革,出现了凭实功而

非血统进入统治阶层的新兴贵族集团,如赵氏之先以御公车而得势<sup>[54]</sup>,范氏因功升迁<sup>[55]</sup>,从而触发了社会等级制度的变动,异姓卿族崛起。目前虽然尚无法确知所有中高等级铜器墓主人的具体身份,不过从山彪镇 M1 和太原金胜村 M251 的墓主人很可能分别为当时晋室重卿魏氏和赵氏<sup>[56]</sup>来看,这些墓的墓主人除了有公室成员外,也势必包含异姓卿族。如果说公室成员出于与周王室间所具有的血缘联系,从而通过随葬仿西周晚期的铜礼器来表现他们对西周礼制的传承,以及显示他们权利的获得依然是源于西周以来的宗法世袭制度,以此将他们与那些凭实功而获得权利的新兴贵族集团区分开来,那么异姓卿族由于他们与周王室间并不存在血缘关系,其亦使用了代表西周礼制的仿古铜礼器,则可能是出于不同的原因。异姓卿族兴起的肇始可能并不相同,但一旦他们进入贵族阶层,成为贵族集团的一员后,在当时血缘政治仍占主导地位的大环境下,他们一方面为保持已获地位在本族内仍以世袭为主,另一方面也会极力尝试将自己纳入到西周以来宗法制度所构建的等级体系之中。使用代表西周礼制的仿古铜礼器,似乎可以凸显其在这个等级体系中所具有的身份、地位,或是给人以其出身正统的表象。但由于这些异姓卿族与周王室间并无血缘维系,同时其贵族地位的最初获得亦非源于血缘,因此这种行为恰恰破坏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制度。这种仿古现象最初在中、高等级墓葬均有发现,并且随葬无盖鼎的数量在一定程度上亦与墓主人的身份地位相关;而到了战国时期,仿古铜礼器仅存在于高等级铜器墓葬中,并且无盖鼎的数量逐渐减少并明器化,其所具有的身份象征意义也因此减淡。仿古器物的这种衰落过程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们对于西周宗法礼制重视程度的减弱,由此反映出宗法制度本身的逐步衰微。

[1] 张辛《中原地区东周陶器墓葬研究》,第1页,科学出版社,2002年。

[2] 郭宝钧《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第84页,文物出

版社,1981年;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第1555、156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 [3] Jessica Rawson, *Novelties in Antiquarian Revivals: The Case of the Chinese Ritual Bronzes*,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Research Quarterly*, vol.22, no.1, Autumn, 2004, pp.1-34; Lothar von Falkenhäusen, "Antiquarianism in Eastern Zhou Bronzes, And Its Significance", *Reinventing the past: Archaism and Antiquarianism in the Chinese Arts and Visual Culture*, Wu Hung (ed.), Chicago ArtMedia Resources, 2010. pp.77-102.
- [4] 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侯马工作站《山西侯马上马村东周墓葬》,《考古》1963年第5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侯马上马墓地发掘简报(1963~1986年)》,《文物》1989年第6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上马墓地》,文物出版社,1994年。
- [5]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侯马牛村古城南墓葬发掘报告》,《晋都新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
- [6]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山西侯马下平望两座东周墓》,《文物季刊》1993年第4期。
- [7]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等《天马一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五次发掘》,《文物》1995年第7期。
- [8] 王志敏、高胜才《运城南相春秋墓清理简报》,《文物世界》1990年第1期。
- [9] 杨富斗《山西万荣庙前村的战国墓》,《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12期;杨富斗《山西万荣庙前村东周墓地调查发掘简讯》,《考古》1963年第5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万荣庙前东周墓葬发掘收获》,《三晋考古》(第一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
- [10]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临猗县程村东周墓发掘简报》,《文物季刊》1993年第3期;赵慧民等《山西临猗县程村两座东周墓》,《考古》1991年第11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临猗程村墓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3年。
- [11]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芮城东周墓》,《文物》1987年第12期。
- [12] 运城行署文化局等《山西闻喜邱家庄战国墓葬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1期。
- [13] 朱华《闻喜上郭村古墓群试掘》,山西省考古研究所《1976年闻喜上郭村周代墓葬清理记》,山西省考古研究所《闻喜县上郭村1989年发掘简报》,《三晋考古》(第一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
- [14]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新绛柳泉墓地调查、发掘报告》,《晋都新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

- [15]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长治分水岭东周墓地》，文物出版社，2010年。
- [16]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长子县东周墓》，《考古学报》1984年第4期。
- [17]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省潞城县潞河战国墓》，《文物》1986年第6期；长治市博物馆等《山西潞城县潞河东周、汉墓》，《考古》1990年第11期。
- [18] 长治市博物馆《山西屯留武家沟出土战国铜器》，《考古》1983年第3期。
- [19]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交口县东周墓葬清理简报》，《三晋考古》（第一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
- [20]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太原金胜村251号春秋大墓及车马坑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9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太原晋国赵卿墓》，文物出版社，1996年。
- [21]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中州路（西工段）》，科学出版社，1959年。
- [22]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市中州中路东周墓》，《文物》1995年第8期；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中州中路东周墓发掘简报》，《文物》2006年第3期。
- [2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河南洛阳市中州路北周墓葬的清理》，《考古》2002年第11期。
- [24]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市西工区几座春秋墓的清理》，《考古与文物》2003年第2期；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西工区春秋墓发掘简报》，《文物》2010年第8期；孙新科《洛阳市西工区203号战国墓清理简报》，《中原文物》1984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1983年洛阳西工区墓葬发掘简报》，《考古》1985年第6期；蔡运章等《洛阳西工131号战国墓》，《文物》1994年第7期；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两座东周铜器墓》，《中原文物》1983年第4期。
- [25]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王城广场东周墓》，文物出版社，2009年。
- [26] 洛阳博物馆《河南洛阳春秋墓》，《考古》1981年第1期。
- [27]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河南洛阳市润阳广场C1M9950号东周墓葬的发掘》，《考古》2009年第12期；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等《河南洛阳市润阳广场东周墓C1M9934发掘简报》，《考古》2010年第12期。
- [28]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体育场路西东周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1年。
- [29] 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市纱厂路东周墓（JM32）发掘简报》，《文物》2002年第11期。
- [30]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市针织厂东周墓（C1M5269）的清理》，《文物》2001年第12期。
- [31]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洛界）高速公路伊川段LJYM74发掘简报》，《文物》2001年第6期。
- [3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工作队《洛阳凯旋路南东周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0年第3期。
- [33]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唐宫路小学C1M5560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2004年第7期。
- [34] 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市道北锻造厂战国墓清理简报》，《文物》1994年第7期。
- [35] 三门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三门峡市西苑小区战国墓（M1）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2期。
- [36] 三门峡市文物工作队《三门峡市盆景园8号战国墓》，《中原文物》2002年第1期。
- [3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县东周秦汉墓》，科学出版社，1994年。
- [38]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上村岭虢国墓地》，科学出版社，1959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三门峡虢国墓》，文物出版社，1999年；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上村岭虢国墓地M2006的清理》，《文物》1995年第1期；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三门峡虢国墓地M2010的清理》，《三门峡虢国墓地M2013的发掘清理》，《文物》2000年第12期。
- [39]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市加气混凝土厂东周墓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1年第4期。
- [40]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等《河南登封告成春秋墓发掘简报》，《文物》2009年第9期；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河南登封告成东周墓地三号墓》，《文物》2006年第4期。
- [41] 河南博物院等《新郑郑公大墓青铜器》，大象出版社，2001年。
- [42] 开封地区文管会等《河南省新郑县唐户两周墓葬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2》，文物出版社，1978年。
- [43]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韩故城兴弘花园与热电厂墓地》，文物出版社，2007年。
- [44]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等《新郑铁岭墓地M429发掘简报》，《中原文物》2010年第1期；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等《新郑铁岭墓地M550发掘简报》，《中原文物》2010年第5期。
- [45] 赵清等《河南新郑新禹公路战国墓发掘简报》，《考古》1994年第5期。

- [46]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郑工作站《新郑市郑韩路6号春秋墓》,《文物》2005年第8期。
- [47] 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安阳市王古道村东周墓葬发掘报告》,《华夏考古》2008年第1期。
- [48]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辉县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6年;郭宝钧《山彪镇与琉璃阁》,科学出版社,1959年;河南博物院等《辉县琉璃阁甲乙二墓》,大象出版社,2011年。
- [49]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河南平顶山应国墓地八号墓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7年第1期;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平顶山市北滢村两周墓地一号墓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88年第1期。
- [50] 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邯郸百家村战国墓》,《考古》1962年第12期。
- [51] 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邢台南大汪村战国墓简报》,《考古》1959年第7期。
- [52] 本文对中原地区东周铜器墓葬年代的断定主要参照朱凤翰《中国青铜器综论》一书的分期成果,将墓葬分为九个时段,即春秋早期早段、春秋早期晚段、春秋中期早段、春秋中期晚段、春秋晚期早段、春秋晚期晚段、战国早期、战国中期、战国晚期。
- [53] 李零《铄古铸今:考古发现和复古艺术》,第8~1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
- [54] 《史记·赵世家》载,“缪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见西王母,乐之忘归。而徐偃王反,缪王日驰千里马,攻徐偃王,大破之。乃赐造父以赵城,由此为赵氏”(《史记》,第1779页,中华书局,1959年)。
- [55] 《国语·晋语八》载,“昔隰叔子违周难于晋国,生子舆为理,以正于朝,朝无奸官;为司空,以正于国,国无败绩。世及武子,佐文、襄为诸侯,诸侯无二心。及为卿,以辅成、景,军无败政。及为成师,居太傅,端刑法,辑训典,国无奸民,后之人可则,是以受随、范”(韦昭《国语》,第45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 [56] 高明《略论汲县山彪镇一号墓的年代》,《考古》1962年第4期;侯毅《试论太原金胜村251号墓墓主人身份》,《文物》1989年第9期;张崇宁《太原金胜村251号墓主探讨》,《中国历史文物》2005年第1期。

(责任编辑:杨冠华)

### The Artifacts Modeled on Antiques in the Burials with Bronzes of the Eastern Zhou Period in the Central Plains

Zhang Liang  
Teng Mingyu

Eastern Zhou burials yielding bronze ritual vessels in the Central Plains region often include vessel types and forms showing rather earlier features and styles but bearing contemporary decors. These bronzes clearly were not handed down from the earlier periods, but made with other bronzes at the same time and just modeled on antiques. This paper collected data from 280 burials yielding bronzes of the Eastern Zhou Period in the Shangma Cemetery in Houma City, Zhongzhou Road Site in Luoyang City and at Baijia Village in Handan City, etc. In the earlier stage of the early Spring-and-Autumn Period, antique style wine vessels were only seen in medium- and high-ranking burials, and most of them were in an assemblage of *jue*-cups and *zhi*-cups, which were popular in the early Western Zhou but almost disappeared in the mid and late Western Zhou Dynasty. The antique bronze vessels from the later stage of the mid Spring-and-Autumn Period to the mid Warring-States Period were all the bronze ritual vessels modeled on antiques of the late Western Zhou Dynasty to the early Spring-and-Autumn Period. The decline of antique style bronze vessels reflects the reduction of attention to the *zongfa* (patriarchal lineage system) and the ritual system, as well as the gradual decline of the patriarchal lineage system itself.

附表一 中原地区春秋早期早段出土仿古铜酒器墓葬统计表

墓 葬	仿古铜酒器	共出铜容器		墓葬等级	备注
		明器	实用器		
北赵晋侯 M93	爵1 觶1 尊1 卣1 方彝1	鼎1 簋1 盘1	鼎5 簋6 壶2 盘1 匜1 甗1	高	
北赵晋侯 M102	爵1 觶1 方彝1	鼎1 簋1 盃1	鼎3 簋4 盘1 匜1 壶1	中	
上村岭 M2001	爵3 觶2 尊3 方彝3	鼎3 簋3 盘3 盃2	鼎7 鬲8 甗1 簋6 簠2 盨4 铺2 壶4 盘1 盃1	高	
上村岭 M2006	爵1 觶1 尊1 方彝1	盃1	鼎3 甗1 鬲4 盨2 簠1 壶2 盘1	中	
上村岭 M2012	爵4 觶6 方彝5 觚1	鼎6 簋6 盘6 盃5 匜1	鼎5 鬲8 甗1 簋4 簠2 铺2 壶2 盘1 盃1 罐2	高	
洛阳润阳 C1M9950	爵1 觶1	盃1 缶1	鼎5 簋4 壶2 甗1 铺2 鬲4 盘2 盃1	中	
平顶山应国 M1	方彝1	盃1 方甗1	鼎5 簋6 壶2 盘1	中	
平顶山应国 M8	爵1 尊2 方彝2	鼎1 簋1 盘1 盃1	鼎4 方甗1 簋4 盘1 匜1	中	
闻喜上郭村 75M1	方彝1	鼎1 盘1 簋1 盃1	鼎1	不清	盗扰
新郑唐户 M39	尊2	鼎1 簋1		不清	盗扰
洛阳润阳 C1M9934	觶2 方彝1	鼎1 盃1 缶1 舟1	鼎2 簋4 壶2 甗1 鬲2 盘2 铺1	不清	盗扰
上村岭 M2008	爵1 方彝2	簋1 盘1	鬲1 簋1 簠1 壶1 壶盖1 匜1	不清	盗扰

\* 表中墓葬等级的划分结果参照滕铭予、张亮《中原地区东周铜器墓分类新论》，《考古》2013年第2期。下同。

附表二 中原地区春秋中期晚段至战国中期出土仿古铜礼器墓葬统计表

墓葬	年代	仿古铜礼器	共出铜容器	墓葬等级	备注
辉县琉璃阁 M80	春秋中期晚段	无盖鼎8	鼎5 鬲6 簋4 敦2 簠4 甗1 盃2 盃1 盘1 匜1 舟1 瓠壶1	高	
新郑李家楼墓葬	春秋中期晚段	无盖鼎15 簋8 壶4	鼎7 鬲9 敦3 甗1 簠6 壶2 盃3 盃2 盘3 匜4 舟5 牺尊1 炉1	高	
上马墓地 61M13	春秋中期晚段	无盖鼎3	鼎4 鬲2 敦4 甗1 簠2 壶2 盃2 匜1 舟1 钁1	中	
长治分水岭 269	春秋晚期早段	无盖鼎5	鼎4 鬲4 敦2 壶2 甗1 簠2 盃1 盃1 盘1 舟1 盃1 勺1	高	
长治分水岭 270	春秋晚期早段	无盖鼎5	鼎5 敦2 壶2 簠2 盃2 盃1 盘1 匜1 舟1	高	
临猗程村 M1002	春秋晚期早段	无盖鼎2	鼎3 敦2 壶2 簠2 盃2 盘1 匜1 舟2	中	
陕县后川 M2056	春秋晚期早段	无盖鼎1	鼎2 敦1 盘1 匜1 舟1	低	
琉璃阁 M55	春秋晚期晚段	无盖鼎7	鼎7 簋4 鬲6 簠4 豆2 盃2 盃2 盘1 匜1 舟1	高	
琉璃阁 M60	春秋晚期晚段	无盖鼎9	鼎20 簋4 鬲6 甗1 簠4 豆1 盃2 盃3 盃3 盃1 盘2 舟1 勺1	高	
琉璃阁甲墓	春秋晚期晚段	无盖鼎5 簋6 壶4	鼎13 鬲4 甗2 簠6 敦1 豆8 盃2 盃2 瓠壶1 钁1 盃1 盘1 匜1 舟1	高	
琉璃阁乙墓	春秋晚期晚段	无盖鼎5 簋4 壶2	鼎5 鬲4 甗1 簠2 铺2 盃2 盘1 匜1 舟2	高	

续附表二

墓葬	年代	仿古铜礼器	共出铜容器	墓葬等级	备注
临猗程村 M1001	春秋晚期晚段	无盖鼎 2	鼎 3 甗 1 壶 2 簠 1 豆 2 鉴 2 盘 1 匜 1 舟 2	中	
长子牛家坡 M7	战国早期	方座豆 2	鼎 7 鬲 2 敦 1 甗 1 簠 2 豆 3 壶 3 鉴 2 盘 2 鏃 尊 1 盆 2	高	
潞城潞河 83M7	战国早期	无盖鼎 3 方座豆 2	鼎 8 鬲 2 豆 6 壶 1 瓠 壶 1 簠 2 罐 2 甗 1 鬯 2 盘 3 匜 1 舟 1 鉴 4 鏃 尊 1 勺 2 炭箕 1	高	
陕县后川 M2040	战国早期	无盖鼎 5 方座豆 4	鼎 12 鼎钩 10 鬲 3 敦 2 壶 5 甗 1 豆 6 簠 2 鉴 4 盘 3 匜 2 舟 2 勺 5 匕 2 毕 1 畚箕 1	高	
太原金胜村	战国早期	无盖鼎 5 方座豆 4	鼎 20 豆 10 甗 3 壶 7 鬲 5 簠 2 鬯 1 鸟尊 1 鉴 4 舟 1 钵 1 罐 1 釜 3	高	
汲县山彪镇 M1	战国早期	立耳小鼎 8 (明)	鼎 6 鬲 2 甗 1 豆 4 簠 1 簠 1 壶 7 甗 1 牺尊 1 鉴 2 盘 2 匜 3 勺 4 匕 3 箕 1	高	盗扰
长治分水岭 M14	战国中期	无盖鼎 2	鼎 7 鬲 4 鉴 1	高	
长治分水岭 M25	战国中期	无盖鼎 1	鼎 5 豆 2 壶 2 鬲 1 敦 2 盘 1 匜 1 舟 1 鉴 2 匕 2	高	
长治分水岭 M26	五期 1 段	无盖鼎 2 簠 2	鼎 5 豆 2 壶 2 钲 2 敦 2 簠 2 鉴 3 盘 1 匜 2	高	盗扰
洛阳体育场路西 M8832	春秋中期晚段	无盖鼎 6	鼎 2 敦 1 壶 3 鬯 2 簠 4 舟 1 盘 1 匜 3 勺 1	高	
洛阳体育场路西 M8836	春秋中期晚段	无盖鼎 6	鼎 1 甗 1 舟 1 盘 1 匜 1 鬯 3 簠 1 壶 3 勺 1	高	
洛阳体育场路西 M8830	春秋中期晚段	无盖鼎 1	鼎 4 敦 1 舟 1 匜 1 鬯 2 簠 2 壶 2	中	
洛阳体育场路西 M8833	春秋中期晚段	无盖鼎 2	鼎 1 敦 1 盘 1 舟 1 匜 1 鬯 2 簠 2 壶 2	中	
洛阳体育场路西 M8821	春秋中期晚段	无盖鼎 2 壶 2	盞 1 盘 1 匜 1 舟 1 簠 2	低	
洛阳体育场路西 M8835	春秋中期晚段	无盖鼎 2	敦 1 盘 1 舟 1 匜 1 簠 2 器盖 1	低	
洛阳中州路 M1	春秋中期晚段	无盖鼎 1	敦 1 盘 1 匜 1 舟 1	低	
洛阳中州路 M4	春秋中期晚段	无盖鼎 2	鼎 1 敦 1 簠 2 鬯 2 盘 1 匜 1 舟 1	低	
洛阳中州路 M6	春秋中期晚段	无盖鼎 1	敦 1 盘 1 匜 1 舟 1	低	
洛阳纱厂路 JM32	春秋中期晚段	无盖鼎 1	鼎 2 敦 1 簠 2 鬯 2 盘 1 匜 1 舟 1	低	
洛阳市 613 所 C1M6112	春秋中期晚段	无盖鼎 2	鼎 1 敦 1 壶 2 簠 2 盘 1 匜 1 舟 1 勺 1	低	
洛阳西工区 C1M7257	春秋晚期早段	无盖鼎 1	敦 1 盘 1 匜 1 舟 1	低	
洛阳西工区 C1M7258	春秋晚期早段	无盖鼎 1	敦 1 盘 1 匜 1 舟 1	低	
洛阳西工区 LBM4	春秋晚期早段	无盖鼎 1	鼎 1 敦 1 鬯 2 盘 1 匜 1 舟 1	低	
洛阳王城广场 LM8	春秋晚期早段	无盖鼎 1	盘 1 匜 1 舟 1 器盖 1	不清	盗扰
洛阳西工区 C1M3498	春秋晚期晚段	无盖鼎 2	鼎 3 豆 3 壶 2 鬯 2 簠 2 舟 1 盘 1 匜 1	中	
洛阳春秋墓 M60	春秋晚期晚段	无盖鼎 3	鼎 2 簠 4 豆 1 壶 1 盘 1 匜 1 舟 2	中	
洛阳体育场路西 M8834	春秋晚期晚段	无盖鼎 1	敦 1 盘 1 匜 1 舟 1	低	
洛阳中州路 M2729	春秋晚期晚段	无盖鼎 1	鼎 1 豆 2 鬯 2 盘 1 匜 1 舟 1	低	
洛阳王城广场 XM37	战国早期	无盖鼎 1	鼎 1 豆 2 壶 1 盘 1 匜 1 舟 1 勺 1	不清	盗扰

说明：琉璃阁 M55、M60 和 M80 见于郭宝钧《山彪镇与琉璃阁》，此书未刊器物图像，但可以确定墓中所出无盖列鼎属于仿古现象，而墓中出土的“铜簠”也可能包含有铜敦，故不能确定其是否属于仿古器物。



### 湖北老河口安岗一号楚墓发掘简报

1992年，襄阳市博物馆联合老河口市博物馆对老河口市仙人渡镇安岗一号墓（编号M1）进行了发掘。墓圻平面呈长方形，南北向，封土和墓道已遭破坏。葬具为单椁重棺，椁室分为头箱和东、西边箱及棺箱四部分。随葬器物放置于头箱、边箱、内棺及内、外棺之间，有铜器、木器、竹器、玉器及竹筒等。经鉴定，墓主为男性。根据墓葬规模、棺椁重数、随葬器物及简文内容判断，安岗一号墓为战国中期偏晚阶段的典型楚墓，墓主身份为下大夫。该墓的发掘初步确认了安岗墓地的时代、等级和性质，为探索战国中期楚国中等贵族墓葬制度提供了重要资料。

### 湖北老河口安岗二号楚墓发掘简报

1992年，襄阳市博物馆联合老河口市博物馆在发掘安岗一号墓的同时，又在其东侧勘探发现了一座土坑墓（编号M2）。随后，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二号墓进行了发掘。二号墓墓圻平面呈长方形，南北向，南设墓道。葬具为单椁重棺，椁室分为头箱和棺箱两部分。随葬器物主要放置于头箱内，有铜器、木器、竹器、玉器及竹筒等。经鉴定，墓主为女性。根据二号墓的墓葬规模、棺椁重数、随葬器物及其与一号墓的关系判断，二号墓属于战国中期晚段的典型楚墓，年代略早于一号墓，墓主等级应为下大夫一级，与一号墓应为夫妻异穴合葬墓。

### 中原地区东周铜器墓中的仿古器物

中原地区出土有青铜礼器的东周墓葬中，经常发现部分铜礼器的器类和形制呈现出较早时期的特点和风格，又往往饰有当时流行的纹饰，显非传世品，而是与其他青铜器同为当时所造，应为仿古器物。文中统计的东周时期铜器墓葬共280座，如侯马上马、洛阳中州路、邯郸百家村等。春秋早期早段仿古酒器仅出现在中高等级铜器墓中，且为西周早期流行、西周中晚期已基本不见的爵、觥相配的组合形式。春秋中期晚段到战国中期的仿古器物均为仿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流行的铜礼器。仿古器物的衰落过程体现了时人对于西周宗法礼制重视程度的减弱，反映出宗法制度本身的逐步式微。